

女子教育深度参与惠州人文精神构建

作者 /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国自古就有女子教育，家庭是实施女子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宋代之前，女子教育大体是德才并重，四德中的“妇言”、“妇工”，包含了对才能的要求；妇德和妇容，也是以才学为基础的。明清两代，惠州士大夫家庭的女子教育没有超越时代局限，贞节观念成为女子教育的主要课题，直到清末才走向进步、开放。无论后人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明清女子教育已深度参与了惠州人文精神的建构。

明代博罗才女为夫殉情

女子教育是明代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的内容之一。嘉靖年间，惠州府城有名儒“惠江先生”叶时，就曾“编著《阳教书》以训男，《阴教书》以训女”，这大概是惠州地区见诸史载的最早专门于女子教育的教科书，显示惠州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女子教育。

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出自明代，她叫孔少娥。孔少娥字文秀，归善（今惠州

市）人。明嘉靖间惠州名士刘确的继配，“能诗，号才女”，她所写的《点翠洲》诗云：“西湖子两相怜，湖面偏宜点翠洲。一段芳华描不就，月湾宛转似眉头。”此诗被清代王士禛所称道。

当然，明代惠州士大夫家庭的女子教育，未能超越时代局限，“贞节”二字一直是女子教育的主题词。明代兵工二部尚书叶梦熊长媳李建，出嫁不久丈夫早亡，其行

为态度很典型。据清阮元《广东通志》载：“叶世仪妻李氏（建），中丞李焘女也，焘总运长芦时，世仪随父梦熊备永平，求婚而许焉。”不料过门还未满月，叶世仪就病发身亡。在丈夫得病时，“李为疏告天，请身代”。丈夫死后，李又欲以身殉之。父母极力劝阻无效，直到婆婆说：“儿死你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你若死，我也一定跟着去死！”这才把她殉夫之念暂时打

消。但不久，她又“忧毁成疾”，撒手人寰，年仅25岁。

用现代观点看，李建的死，是其纯净的灵魂接受了理学原则的教唆，从而对生命进行自我摧残和毁灭，说明封建礼教对人的个体生命，特别是女性的生命权利，包括她们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关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李建无疑是被“理”所虐杀，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最多的，相传七女湖就是因为有七女“以明亡坠湖死者而得名”。

这些烈女节妇多出身于士人之家，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们面对凶残的异族军队，决绝地选择死亡，“死免污辱不可生”的贞节观念固然在起作用，但也不能否认确有“严辨华夷”、欲与家国共存

亡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蕴涵其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本来就是可以重合一致的。

李建的“殉夫”和韩氏女的“殉国”，无论后人怎样解读这两者间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她们思想成长和人格铸造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所小学甚至中学。

自晚清至民初，惠州古城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教育世家，包括以苗致信为代表的北门苗家，以黄植祯为代表的柏子树下黄家，以叶史料为代表的高营房横街的叶家，以王学潜为代表的下角王家，还有冯重熙、冯宝瑛兄弟为代表的朱紫巷冯家。他们坚守着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追求，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四年（1908年），创办了惠州第一所女校“惠州振坤女子学堂”，聘请邓承修之女邓梦湘作总教习，惠州现代女子教育由此蹒跚起步。

同年，冯重熙又与同邑

名人廖雨生、杨固初、黄选三、夏梦九、廖计伯组成“筹办会”，冲破重重阻力，在清廷颁布《钦定女子教育章程》之次年，亦即光绪三十

年，冯重熙不但在女师执教，还率先把三个女儿送到女师读书，毕业后她们都成了惠州最早的一批女教师。

冯重熙和冯宝瑛兄弟，

以及他们的儿子、儿媳，女

女、女婿，大都从事过教书职

业。若集中起来，足够承办一

所小学甚至中学。

自晚清至民初，惠州古

城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教育

世家，包括以苗致信为

为代表的北门苗家，以黄植

祯为代表的柏子树下黄家，

以叶史料为代表的高营房

横街的叶家，以王学潜为

为代表的下角王家，还有冯

重熙、冯宝瑛兄弟为代表的

朱紫巷冯家。他们坚守着

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

追求，几代人坚持不懈地

努力着。

次年，在经元善、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国人

创立的第一个女校“中国女学

”（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开

办，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都

慷慨捐助。

在维新运动者为女学鼓

与呼的时候，保守势力以“有

伤风化”为由力阻变革。

就连观念相对开放的革新名臣张之洞也很谨慎，他忧心忡忡地

说：“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

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

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

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

婿之风……”

尽管阻力很大，但潮流一

开，已然势不可挡。至1909

年，全国入读女校的女子人

数超过6.5万人。“女学生”

成为

一种风潮的代名词，女校每

有运动会、毕业礼等，都受到社

会关注，观者云集，媒体也竞

相报道。

顺应大势，1907年（光绪

三十三年）清廷颁布《女子小

学堂章程》，正式承认女子受

教育的权利。但承认的只是中

小学教育。1912年，中华民

国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规定

初等小学四年制，可男女同

校；并可设立女子中学、女子

师范。

女子教育放开的步伐在

加快。创办女子高等教育也成

了大势所趋。早在1905年，中

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

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已开始招

生。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高等

部成立，1919年更名为北京女

子大学。

就这样，在近代大变局

中，在内外因素的合力推

动下，中国的女子教育迅速实

现了机制变革，以全新的面貌走

向了现代。

历史总能给人以有益的

启示，惠州清代的文化教

育也不例外。

清代惠州文教的发展几

经曲折。顺治至康熙年间，满

清贵族以强悍凶残的军事手

段夺取和巩固统治中国的权

力，意识形态阵地来不及完

全占领。特别是在平定较迟

的岭南，影响士风的思想大

体上还是前明余风。因此，清

初惠州文坛如日夕之云霞，

依稀返照着晚明的亮色。

当然，这其中还有个重

要原因，该时期在惠州任职

的官员们，骨子里还流淌着

儒家文化的血脉，身处乱世

仍不忘给文教事业以应有

的扶持。

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

钳制思想言论，对反清复明

意识最为强烈和顽固的南方士

子，不断加大整肃力度。

产生于明代至清初的优秀文

化成果被横扫，不少被后学者

视为榜样的典型人物如杨起

元、韩日继、函可等被否定，

他们的思想被严厉批判，著

作被全面禁毁。文坛因之寂

寥，人才从此凋零，惠州文教

受到的深刻伤害，直至百年

后的清末还没完全平复。历

史告诉我们：清初文字狱是

造成清代惠州文教发展迟滞

的最大祸因。

晚清惠州文教的复振，

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嘉道以降，文禁日渐宽松，

社会相对稳定，一批才华横溢

的名士相继出任惠州行政首

长或书院山长，有力推动了

惠州文教的发展。尤其是

继王燧之后的又一位“风流

太守”伊秉绶，任惠州

知府六年，复建书院，倡导

风雅，弘扬学术，营造宽松

的文化氛围，使沉寂多年的

惠州文教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惠

州杰出的人才，大都出自丰

湖书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岭南名儒梁鼎芬主讲丰

湖书院，下车伊始即建祠祀

奉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又创

丰湖书院藏在，鹅城开读书

风气，启导民智。他教出的

“丰湖十子”有4位考中进

士，其余都是举人或贡生，

成为享誉岭南的杰出人才。

没有优秀的学生，教育培养人才首

要注重培养师资，这也是

历史留下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人才是第一

资源。从长远看，一个国家

乃至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最

终并不取决于它表面华丽的

公共建设，也不取决于它一